



新编21世纪经济学系列教材

经济思想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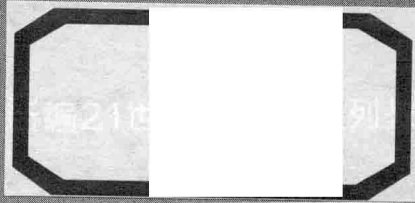
第二版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in Western World

张旭昆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F021
40



经济思想史

第二版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in Western World

张旭昆 编著

RFID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思想史/张旭昆编著. — 2 版.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1
新编 21 世纪经济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23087-0

I. ①经… II. ①张… III. ①经济思想史-西方国家-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F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7149 号

新编 21 世纪经济学系列教材
经济思想史 (第二版)
张旭昆 编著
Jingji Sixiang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联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规 格	185mm×260mm 16 开本		2017 年 1 月第 2 版
印 张	23.75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54 000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张旭昆，1982年2月本科毕业于杭州大学经济系。现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宁波大学商学院教授；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介绍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的发展过程。包括古希腊、古罗马经济思想，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本主义早期的重商主义思潮，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的古典经济学，从边际革命开始的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到凯恩斯革命。它涉及几乎所有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包括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当代微观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等。

本书的特点一是力求以原生态介绍西方经济学家的思想，例如对于亚当·斯密的介绍侧重于其关于如何发展经济的观点。二是尽可能以今天的眼光重新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例如对于萨伊的收入分配理论，以今天的眼光进行客观介绍，不做教条式的批判。三是力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前 言

一、为何要了解经济思想史

经济思想史就是介绍、研究经济思想发展演化的历史。为何要了解、研究经济思想的历史？

一门学科的逻辑体系越完善，对其学科发展历史的了解就显得越不必要，思想史的课程就越无地位。从单纯的学以致用目标出发，逻辑体系完善的学科，学生掌握其逻辑推导过程，就足以掌握其基本原理。只有逻辑体系欠完善的学科，似乎才有必要了解其思想史。

但从发展一门学科的目标出发，即便是逻辑体系完善的学科，仅仅掌握其逻辑推导过程也仍然不够。尤其是社会科学，它与自然科学的最大不同在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会改变自然法则，而社会科学的发展会引起人们行为方式的改变，从而引起许多社会法则的变化，导致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因此，根据先前社会现象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即便具有完善的逻辑体系，也往往难以解释新的社会现象，解决新的社会问题。

经济学是一门会改变人们行为方式的学科，它与实际经济生活形成一种正反馈的互动过程。在此过程中常会出现一些原有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新现象。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马歇尔的理論难堪，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让凯恩斯的理论蒙羞。

当主流经济学可以为当前经济现象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为当前经济政策提供有效的论证时，了解经济思想史似乎没有多大必要。然而一旦主流经济学不能胜任，了解经济思想史的必要性就凸显出来。居安思危，从长远看，为了推进经济科学的发展，那些愿意献身于经济学的学子完全有必要了解经济思想的发展历史。因为在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常常

会出现一些虽然在当时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但对于解释以后出现的经济现象颇有启示作用的思想“基因”。整个经济思想史就是一个经济思想的“基因库”。它是一个丰富的宝库,其中有许多暂时不为当前的主流思想所接纳的理论观点。但是在社会面临新问题的時候,它们往往能够给人以启迪,帮助经济学家解释新现象、解决新问题。面对人类社会不确定的未来,许多曾经非常有效的主流经济观点可能会由于新现象的出现而失去解释能力,而以往被人们认为无用的甚至错误的异端经济思想却反而可能会发挥效力。所以,了解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哪些经济思想观点,对于经济学家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时发挥创造性、推出新的思想产品,具有重要意义。马歇尔的供求均衡价格论在17世纪的洛克和19世纪的马尔萨斯、萨伊那儿就已经萌生,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也早在17世纪的曼德维尔、19世纪的马尔萨斯和20世纪初的桑巴特那儿草创。马歇尔和凯恩斯对于经济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实际上都是他们在熟谙经济思想史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的结果。

同时,了解经济思想的历史,有助于了解思想产品的生产规律,了解经济思想发展演化的特征,了解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够有效地生产思想产品,了解政府何种政策才能更有效地促进思想产品的生产。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使世界经济难以复苏的主权债务病症,似乎再次表明,经济学永远不可能得到一个一劳永逸的、能解释所有经济现象、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通用原理,永远需要通过重温历史寻求新的知识。

二、经济思想史的三种研究视角

经济思想如何发展演化,这既是一个科学考古学问题,又是一个科学心理学问题,也是一个科学社会学问题。

从科学考古学的视角出发,首先需要厘清基本史实:何时何人在何处出版发表了何种论著何种观点,以后又在何时何地影响到何人。这就需要以编年史为基础,进一步梳理各种经济思想观点的传承脉络,为各位经济学家和经济观点建立“家谱”。

作为科学考古学的经济思想史,可以大致分为通史和专题史两大类。

通史需要阐述古今中外整个经济思想发展演化的历史过程,其代表作有蒋自强先生领衔著述、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四卷本《经济思想通史》;还有专门阐述某个地区自古至今的经济思想史,如外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等,其代表作有约瑟夫·熊彼特的三卷本《经济分析史》、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赵靖和石世奇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等。

专题史,一种是把整个经济思想分解成若干组成部分,然后专注于某个经济学论域或论点、某个流派的发展历史,其代表作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张培刚和厉以宁的《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安道尔·马加什的《现代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晏智杰的《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等。另一种则是把时间进行分段,专门研究某个时段(往往是一些重要时段)的经济思想,其代表作有布莱克等人的《经济学的边际

革命》等。

从科学心理学的视角出发，主要是研究单个经济学家（往往是一些重要经济学家）的思想脉络和心路历程，其成果往往是一些重要经济学家的个人生平传记和思想传记，如凯恩斯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传》等。当然，从这一视角出发，还应当研究那些重要经济学家涌现出新观点的心理过程，即创新的心理过程，以便概括出经济学家创新活动的一般规律。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发的研究领域。

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就是要探讨导致经济思想发展演化的社会因素，探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更有利于经济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对此，在非常抽象的层次上，可以借助思想产品的供求模式或思想市场来分析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化。^①

与物质产品相比较，思想产品具有五个特征：公共性、单件性（或斥重复性）、意义的模糊性、效用的不确定性和外部性。

经济学思想市场上的需求方可以大致分为相对独立的三类主体：政府、公众和专业学术团体。这三类主体的需求既相对独立，又有一定的交集。前两类主体的需求往往在决定经济思想发展的长期趋势上起着主要作用。三类主体的需求通常包含两个方面：（1）需要解释哪些经济现象，需要解决哪些经济问题，即需求指向。三类主体需求指向的并集就构成整个社会的课题集合。（2）用哪种理论来解释这些经济现象，用哪种政策来解决这些经济问题，即需求落点。决定需求指向和需求落点的因素有所不同，因此在分析需求的决定因素时，必须区分需求指向的决定因素与需求落点的决定因素。

经济学思想市场上的供给方就是经济学家。供给所需的投入包括经济学家（人数和素质）和经济学家所掌握的知识资本。

从整个社会来看，生产经济学思想产品与生产其他学科思想产品，以及从事科学活动与从事实际部门（政府、工商企业等）活动的相对收益（包括声誉、金钱和纯粹兴趣的满足），是决定经济学家人数和素质的重要因素之一。决定经济学家人数和素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从事经济科学的相对难易程度。

经济学家的知识资本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经济学知识和非经济学知识。经济学知识首先包括以往对各种经济现象的解释说明，对各种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但更重要的是以往分析经济现象和解决经济问题时所提出的各种概念、假设和分析方法。非经济学知识，既包括经济学家的哲学观念和其他学科的专业知识，又包括各种基本能力，如发现问题尤其是重大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形成概念的能力、提出恰当假设的能力、为问题提供基本正确的答案或指出解决问题的基本正确方向的洞察力等等。

经济学家及其所掌握的知识资本决定了思想产品的生产可能性集合。它包括了在既定的资源条件下所可能生产的一切思想产品。它表明一定的经济学家和知识资本能够解释哪些经济现象、解决哪些经济问题，但无法解释哪些现象、解决哪些问题。但是思想产品的生产可能性集合还要进一步受到思想市场性质的约束。那些受到世俗政府或宗教组织的意识形态控制的非自由的思想市场，能够被允许生产的思想产品的范围一般都要小于其生产

^① 参见张旭昆：《思想市场论——分析知识产品演化的一个模式：以经济学为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

可能性集合。这个受到约束的范围可以称作思想产品的可允许生产集合,它一般是思想产品生产可能性集合的真子集。只有在自由的思想市场中,两者才会一致。

新思想产品总是出现在可允许生产集合与课题集合的交集之中。

可允许生产集合表明,在资源和思想市场性质的约束下,有哪些思想产品有可能被生产出来。但这些思想产品中究竟有哪些能被实际生产出来,则取决于经济学家在追逐声誉、金钱或纯粹兴趣满足时的选题行为。

三、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发展脉络

经济思想自 16 世纪以来的发展,说明了供求模式在分析经济思想演化时的有效性。由于难以得到直接反映历史上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和需求落点的资料,所以只能从那些留传至今的经济学论著所解决的课题来间接地推断当时当地公众和政府的需求。可以说,凡是符合公众和政府需求指向并成为需求落点的论著,往往受到公众和政府的关注;凡是迎合公众和政府需求指向的论著,往往出版后不会被公众和政府所注意。当然,不被公众和政府注意并不是说它也不会被专业学术团体关注,也不意味着它永远不会引起公众和政府的关注。

(一) 富国裕民: 16—19 世纪初经济学的主题

1. 富国裕民的需求指向

从 16 世纪到 19 世纪初,英法两国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主要是如何富国裕民,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在理论上,他们要求说明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在政策上,他们要求能增加国民财富的政策。围绕富国裕民这一主课题,形成了许多派生子课题,例如怎样增加王室和政府收入的财政问题、货币问题、对外贸易问题等。

公众和政府的这种富国裕民的需求指向,与那三个多世纪英法两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价值观念和知识背景密切关联。从经济上看,那时英法两国都还未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在这种国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很容易(但远不是肯定)形成追求富国裕民的价值观念。从政治上看,英法两国都已摆脱中世纪的封建状态,建立了统一民族国家。追求国家的富强以及王室或政府财政收入的充足,成为统治者关注的首要问题。

2. 发展论而非价值论、分配论

与这一阶段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相对应,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发展论而非价值论、分配论。英法两国的重商主义(包括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英国从威廉·配第到亚当·斯密的早期古典主义,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到重农主义再到西斯蒙第(指出版《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以前)、萨伊和巴斯夏,他们要解决的课题都是如何富国裕民、发展本国经济。他们的区别在于对财富性质的不同看法、对致富原因的不同看法以及致富的不同方法。只有紧紧抓住富国裕民、发展经济这一主线,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他们的论著,把握其历史意义。

在这一阶段,价值论、分配论并非经济学家考虑的主要问题,而只是他们在考虑发展

问题、富国裕民问题时的副产品。把价值论、分配论当作这一阶段经济学家尤其是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论题，其实是 19 世纪经济学家的理解和解释。这种理解和解释受到 19 世纪公众和政府需求指向的强烈影响。在这种需求指向的影响下，19 世纪的经济学家更注重、更强调这一阶段经济学论著中的价值论、分配论内容，以至直到今天，大多数经济学说史论著仍然是以价值论、分配论为主线来叙述从 16 世纪开始的经济思想发展，而严重忽略了早期经济思想中富国裕民、发展经济这一主线。

若要尽量避免对前人论著的主要内容的理解偏差，可以采用内容定量分析法来分析前人论著的主要内容，即根据不同内容在论著中所占篇幅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对于一本书来说，可按页数计算）来确定一部论著的主要内容。该方法假设作者是在他自认为最重要的内容上花费最多笔墨。当然这一前提未必完全正确，但在没有更好的定量方法来判定作品的主要内容时，显然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对每位经济学家的论著都严格采用内容定量分析法来判定其主要内容。但任何一位阅读过英法两国从 16 世纪到 19 世纪初的主要经济学论著的人，只要他不过分偏重价值论、分配论，那么他总会发现发展论是这一阶段经济学的主题。以威廉·配第为例，读遍他的五本主要经济学论著——《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货币略论》——就可以看出，他所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改革税制、如何发展英国经济、如何改变殖民地的落后面貌、如何正确看待货币。而价值论、分配论只是他考虑上述问题时的副产品。再比如在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魁奈的论著中可以算作价值论、分配论的内容比重也很小，但是可以算作发展论的内容则触目皆是。

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论著的名称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由此可见他关心的首先是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这种关心构成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及经济自由政策主张的基础。

《国富论》按中文版计算，上下两册共 893 页，各部分内容的绝对量和相对比重见表 1。

表 1

内容主题	页数	比重 (%)	备注
价值论、分配论	180	20	上册第 26~169 页，第 208~229 页，第 235~251 页
发展论	398	45	上册第 5~19 页，第 253~382 页，下册第 1~253 页
财政论	258	29	
其他	57	6	

由此可见，发展论或富国裕民论在斯密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而价值论、分配论只占次要地位。价值论、分配论与整个《国富论》的规模与意义相比，似乎只是一个相对小的分析点。

从斯密写作《国富论》的过程也可以看到他更重视发展论而非价值论、分配论。一般

认为,《国富论》的前身是《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以下简称《演讲》)。在《演讲》中价值论、分配论都不占据主要地位,这可从价值论、分配论在《演讲》中的排序(第二篇第二部分第七节)及所占篇幅看出来。从《演讲》的内容来看,斯密的分配学说最初并不是《国富论》第一篇的主要内容,尽管第一篇标题提到分配问题。显然斯密未去法国以前,早已写好分工、货币、价值和职业工资差异的原因这些部分的内容,而分配计划则是个空白。后来他从重农学派处得到必须补充一个分配研究的建议,因此他把自己所想的内容附在已写好的价值学说之内,而且斯密的价值理论完全是他的发展论或富国裕民论的附论。在《演讲》中,这一点特别明显,斯密认为使商品市场价格永远停留在自然价格之上会减少国家的财富,使市场价格跌到自然价格之下的措施也有相同影响。由此可知,斯密把市场价格对自然价格的背离看作是国民财富减少的原因。所以他就要探讨自然价格的决定因素和衡量尺度,以及市场价格对自然价格产生背离的原因,这种探讨就构成了他的价值论。

3. 斯密革命:经济理论长期逐步演化的结果——从供给角度的说明

在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英法两国如有如此众多的经济学家始终围绕富国裕民问题出版论著,这只能从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中得到解释。在这段时间里,围绕如何富国裕民这一主题,经济学由重商主义发展到古典主义。这是经济学演化中的第一次革命。这场革命以斯密的《国富论》为主要标志。这场革命是经济理论长期逐步演化的结果,是需要从供给角度去加以解释的。如果把这场革命成功的标志定为两个:(1)斯密的政策主张为公众和政府所普遍接受,以及(2)理论体系在专业学术团体中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可,那么成功原因要从公众、政府和专业学术团体需求落点的变化上去说明,要从造成需求落点变化的因素上去说明。

斯密革命的要点是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提出了一整套不同于重商主义的论点。(1)财富不是金银货币,而是由生产性劳动者所生产出来的有用物品。(2)导致国民财富增长的第一个原因,是生产性劳动者人数的增加以及他们之间的分工,而这两者都有待于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则有待于节俭。(3)导致国民财富增长的第二个原因,是生产性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商品能够在市场上按其自然价格出售,或者说商品市场价格能够自动趋向其自然价格。这就需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因为干预总会使市场价格长期偏离自然价格;而减少干预就要在贸易方面实现自由贸易,在国内消除妨碍资本和生产性劳动者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让市场调节进出口贸易和资本与劳动者的流动。(4)为了说明自然价格的决定和衡量,他提出了价值论和分配论。(5)为了论述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他提出了“经济人”假设和“看不见的手”。

斯密的上述论点对于重商主义是一次真正的革命。但它是斯密在继承前人所创立的知识资本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结果。斯密关于财富性质的看法,在他之前的一些英国经济学家那儿已经出现。在法国,由于约翰·劳计划的破产,斯密的观点也已被重农主义者所特别强调,甚至在布阿吉贝尔那儿就早已被提出。对于分工的意义,配第早已谈到,斯密的新见解主要是分析了分工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这属于对原有理论的深化。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是重农主义者提出的一对概念,斯密对它们进行了重新解释,改变了它们的内涵。斯密的资本理论恐怕与重农主义者也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因为在《演讲》中，几乎没有生产性劳动及资本方面的内容，而在《国富论》中，它们却占据了重要地位。关于节俭的意义，大卫·休谟已经充分肯定，只是没有把节俭和资本积累明确联系起来并加以强调，而斯密则补上了这一环。主张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是在法国最早提出并产生影响的（虽然严格地讲，英国商人达德利·诺思更早提出了这一主张，但在当时并未产生影响。它被发现是在法国人自由放任的主张早已传遍英法两国之后）。但对这一主张能增进财富的原因所进行的分析，当属英国的经济学家们。在休谟之前，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和杰·范德林特就已经看到一国所拥有的货币数量对该国物价水平的影响，但他们基本上仍然坚持重商主义的外贸顺差观。休谟在他们的基础上向前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建立了进出口贸易自动平衡理论。由此证明在自由放任条件下，重商主义的顺差论是一个长期无法实现的目标，同时也证明一国的货币不会长期被输出，而是会自动趋向某一与该国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水平，因此政府干预完全没有必要。可以说坎蒂隆和范德林特提出了最终将重商主义置于死地的理论——货币数量论，但仍然坚持重商主义的政策目标——外贸顺差。休谟则运用货币数量论指出了重商主义政策目标的不可实现性，以及其政策手段——政府干预——的不必要性和不合理性。而斯密则进一步将休谟对货币所作的上述分析，推广到所有商品上。斯密与休谟是有交往的，他不可能不从休谟那儿受到启示。用今天控制论的术语来讲，休谟提出了一国货币的供求在其价格的作用下自发趋向均衡的负反馈机制，而斯密则指出这一负反馈机制存在于一切商品中。因此，不仅在外贸方面，政府干预是不必要的，而且在一切商品中，政府干预同样是不必要的。在自由放任条件下一切商品自发趋向供求平衡，市场价格自发趋向自然价格，而这又将是更有利于财富生产的状态。

综上所述，斯密革命是经济思想逐步演化的结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少经济学家或者在基本理论上，或者在政策主张上，或者在这一问题上，或者在那一问题上，陆续提出了一些否定重商主义的命题。斯密的作用便是把这些分散的命题连结成一个有机的体系。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斯密并不是简单地把前人的东西拿来堆在一起。由此可知，斯密革命只是经济思想长期演化过程中的最后一环。

4. 斯密革命：需求落点的转移

经济理论在长期演化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知识资本，有助于说明斯密革命是如何发生的，但还不能说明斯密革命何以成功。举两个例子说明单凭理论本身的特征并不能保证它能取得成功。一个例子是英国商人达德利·诺思在1691年匿名出版的《贸易论》，这是第一部鼓吹自由贸易的小册子。李嘉图在1822年对它评价甚高。但它竟被埋没了一个多世纪，何以如此？只能说是生不逢时。17世纪末，英国国力尚不强大，仍需借助政府干预来发展经济，一本鼓吹自由放任的小册子自然不可能成为公众和政府的需求落点，尽管它迎合了他们富国裕民的需求指向。另一个例子是德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希·李斯特于1841年出版的反对斯密自由贸易主张的论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而李斯特随之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难道自由贸易主张不正确？非也。原因在于在当时的德国，斯密的主张无助于经济发展，所以不能成为公众和政府的需求落点。当时的需求落点只能是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

斯密革命的成功,首先在于1776年以后的英国已不再像17世纪和18世纪初期那样仅仅是二流国家。它已经开始成为超过荷兰和法国的一流强国,在18世纪最后的2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使英国终于成为整个19世纪的一流强国。在这样一种国势之下,自由放任无疑是比政府干预更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因此,公众和政府的需求落点便逐步由重商主义的干预政策转变为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放任政策,为自由放任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的斯密体系便为公众和政府所普遍接受。

斯密革命成功的另一因素是把以往零散出现的经济思想综合成一个理论体系。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国富论》一书取得成功的原因是斯密极为出色地完成了协调整理这一工作。在斯密之前,英国的经济学论著大多是商人、哲学家所写,不成体系。斯密是第一个以学者身份建立经济学体系的人,这使他比其他具有类似思想的人更容易为专业学术团体所接受。当然,单凭一个体系并不能被专业学术团体所接受。例如,重商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就曾于1767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但由于政策主张不符合时代需要,所以未能在公众、政府和专业学术团体中取得成功。所以说,政策主张提出的适时,是斯密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而能建立一个为其政策主张进行论证的理论体系,是斯密革命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二) 解释和消除收入分配不均、论证市场机制的有效性: 19—20 世纪初经济学的主题

1. 收入分配: 新的需求指向

英法两国公众和政府需求指向发展的第二阶段大致是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自18世纪最后的2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到这时已取得重大成果,随着1815年反对拿破仑战争的结束,英国最终确立了自己一流强国的地位。但广大劳动人民却并未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果实,仍处于贫困状态,富国的目标实现了,裕民的目标却依然遥远。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公众和政府的目标逐渐由富国和发展转变为收入分配的公正。政府之所以关注收入分配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处理不当,将造成政局的不稳。代替富国和发展这一课题,如何解释工业革命以来在收入分配中出现的贫富不均现象,能否改善这种现象,如何改善这种现象,便成为新的热门课题。这种新的需求指向使该阶段英法经济学的主题由发展论转变为价值论、分配论。

当然,这种新的需求指向虽然是主要的,但绝不是唯一的。在这一阶段,如何解释经济波动、如何通过货币政策克服波动、如何说明国际贸易,同样也成为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围绕这些课题,经济理论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因篇幅所限,下面一般不展开论述这些领域经济理论的发展演化。

1817年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下简称《原理》)的出版,可以看作是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原理》一书中提出把收入分配作为研究重点,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李嘉图在写给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中,反对马尔萨斯关于经济学是研究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科学的说法,强调经济学应当探讨决定产品在共同制造这种产品的各阶级当中进行分配的法则。李嘉图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上与斯密有重大差别。斯密强调的是富国裕民、经济发展,价值论、分配论只是附论。李嘉图则相反,把发展论抛在一边,突出强调了价值论、分配论。当然,李嘉图也谈到发展,谈到资

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长远趋势，但其目的是为了分析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说到底还是以分配论为中心。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方面，还是马尔萨斯更符合斯密的原意。但这恐怕也是马尔萨斯不像李嘉图在 19 世纪享有那么高声誉的原因之一。当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已经不再是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而是收入分配时，马尔萨斯便显得落伍，而李嘉图则迎合了新的需求指向。

2. 价值论、分配论成为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自李嘉图的《原理》出版以来，收入分配问题吸引了整个 19 世纪乃至 20 世纪最初 20 年的绝大多数英国经济学家。作为分配论基础的价值论，开始成为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之一。任何一位通读过李嘉图之后的重要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詹姆斯·穆勒、西尼尔、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杰文斯、马歇尔等）的主要论著的人，都会肯定这一断言。

在法国，自西斯蒙第 1819 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以下简称《新原理》）之后，发展论的主题也逐渐让位于价值论、分配论，还有周期理论。在法国，主题由发展论转变为价值论、分配论和周期论，是以对发展论的反思为开端，突出表现在西斯蒙第的《新原理》中，该书对经济学说以财富增长为目标提出了质疑，对斯密学说提出了质疑。

在英国，上述主题的转变是潜移默化进行的。在斯密那儿，资本积累是增进分工和增加生产性劳动者人数的基本因素；而节俭则是积累资本的主要手段。循此思路，李嘉图很自然地把发展论的主题转换成价值论、分配论的主题。在工人只赚取维生工资的条件下（这仅仅是工业革命初期的现实，斯密显然并不具有这种观点），要依靠工人节俭来积累资本是无望的。而由于地主阶级天性挥霍，要依靠地租来积累资本也勉为其难。于是，唯一能履行积累职能的便是资本家阶级，积累的源泉便只能是利润。于是，收入分配便成为支配资本积累的一个主要因素，对增长因素的研究就这样转变为对收入分配的研究。同时，斯密也在李嘉图等人的笔下被解释为一个主要是研究价值论、分配论的经济学家。

实际上应当以李嘉图为界，把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划分为主要研究发展问题的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如配第、坎蒂隆、诺思、范德林特、休谟以及斯密）和主要研究价值论、分配论的后期古典经济学家（如李嘉图、穆勒父子、麦克库洛赫、西尼尔等）。后期古典经济学家与早期古典经济学家不仅在研究重点上存在着差异，而且在方法上也存在显著区别。斯密的方法兼顾归纳与演绎，在《国富论》中抽象的演绎推理与具体的历史分析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李嘉图的方法则是纯粹的演绎，从一些高度抽象的假设前提出发，推导出理论结论和政策结论。李嘉图的《原理》可以说完全没有历史。李嘉图的抽象演绎法对其后的经济学说尤其是英国经济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历史学派除外。因此英国学者哈奇森认为李嘉图（连同老穆勒）制造了一次方法论上的革命，认为与亚当·斯密相比，李嘉图在研究主题方面的变化不如在方法上的改变更重要，对后人的影响更大。

方法上的变革显然不能从社会需求指向变化作出解释，它显然与李嘉图所掌握的知识资本有关。据说李嘉图在钻研政治经济学之前，曾钻研过自然科学，大概是自然科学在叙述上的抽象演绎法影响到他研究经济学的方法。



研究重点的转移,尤其是在李嘉图之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有那么多英法经济学家专注于价值论、分配论,这不能不以公众、政府以及专业学术团体三者的需求指向来加以说明。需求指向由发展问题转换为分配问题的缘由,只能以工业革命造成的英法两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来解释。工业革命一方面改变了英法两国的国力,使之成为世界上的强国;另一方面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在初期甚至造成劳苦大众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这两方面的强烈反差不能不使公众及政府关注收入分配,使经济学家去迎合这种需求指向。西斯蒙第、马歇尔等人都是目睹了劳动群众的贫困现象之后而改变观点或投身于经济学研究的。

德奥两国的经济学同样经历了从发展论到价值论、分配论的过程。当德奥两国经济相对落后时,公众和政府关注的首先是如何富国、如何发展经济。奥地利重商主义经济学家霍尼克 1684 年出版了《奥地利富强论》,再版 12 次,享誉达一个世纪之久,其主要内容并非价值论、分配论,而是发展论、富国论。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 1841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其主要内容也不是价值论、分配论,而是发展论、富国论。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在德语世界已经得到传播的时期,李斯特几乎完全不研讨价值论、分配论,而致力于研究发展论、富国论,这很难单纯地从他的个人偏好去解释,只能看作是德国公众和政府需求指向影响的结果。李斯特之后的德国历史学派,其论著虽然充满学究气,但透过这层学究气就可以发现,他们所关心的仍然是发展问题、富国问题。他们与英法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区别在于研究发展的方法不同。他们喜欢采用个案描述,而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则侧重于综合归纳。这种区别源于各国经济学家的知识背景的差异。当德奥两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工业化进程开始之后,公众与政府的需求指向也逐渐发生变化,由关心发展和富国转变为关心收入分配。马克思主义在两国的广泛传播,以及奥地利学派的兴起,都标志着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由之前的发展问题转变为当前的价值问题和分配问题。

对于价值论、分配论在经济学文献中占统治地位达一个世纪之久,罗宾逊夫人在其《资本积累论》的前言中认为,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经济分析,被人用价值论替代了。这一更替之所以发生,有种种根深蒂固的政治原因,也有一种纯粹技术的、知识的原因。可惜她重点分析的是纯粹技术的、知识的原因,而没有分析她所说的种种根深蒂固的政治原因。其实她所说的政治原因就是由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价值观念和知识背景三者决定的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她正确地看到了古典学派(严格地讲是早期古典学派)的主题是发展论、富国论,看到了这一主题被转换成价值论。

3. 19 世纪初围绕价值论、分配论的争论以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小穆勒)的综合在价值论、分配论成为经济学主题的一个多世纪里,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两次综合和一次革命:小穆勒所进行的第一次综合、边际革命,马歇尔及克努特·威克塞尔所进行的第二次综合。对于这两次综合和一次革命,不能用公众和政府需求指向的变化来说明,只能用思想产品供给的变化及需求落点的转移来说明。

第二阶段初期,即从李嘉图出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到小穆勒进行第一次综合为止,经济思想的演化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围绕价值论、分配论(以及危机论),李嘉图、萨伊、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四人之间展开竞争。二是一些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库洛

赫、詹姆斯·穆勒，等等）围绕在李嘉图周围，改造、深化和拓展李嘉图体系。三是小穆勒在综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上，于1848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建立了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个综合体系。下面分别分析这三个方面。

在第二阶段开始以前，斯密学说得到政府认可，成为制定政策的依据。这种情况可称作思想市场的均衡。但这种均衡在第二阶段被打破了，因为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变了，斯密时代的课题与19世纪初由工业革命和都市化带来的课题截然不同。新课题需要新思想产品。于是在第二阶段开始之后不久，便出现了经济学家围绕价值论和分配论展开的激烈竞争。

在争论中经济学家通常都是从斯密学说中为自己的论点寻找根据。这是因为第二阶段的经济学家在分析价值问题、分配问题时，所能依靠的知识资本主要是《国富论》中有关价值和分配问题的论述。斯密在解决发展问题时提出的价值论和分配论观点，成为第二阶段初期经济学家共同的知识资本。所以在第二阶段中经济学家研究价值论、分配论，不仅由于公众和政府的需求，也由于斯密从供给方面为他们提供了可用的知识资本。前面讲过，《国富论》中讨论的价值论和分配论，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步发展充实起来的，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即进行多种解释的可能性。所以第二阶段初期的经济学家，几乎都通过改变斯密的部分命题，坚持另外一些命题，来建立独立的价值论、分配论。斯密就好比是一把打开的纸扇的扇轴，而那些以他为出发点的经济学家就像是各个扇骨。围绕新的需求指向而出现的分化现象、竞争现象，表明思想市场处于失衡状态。

在第二阶段初期的各种价值论、分配论中，李嘉图的论点曾在一段时间里更好地适应了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成为他们的需求落点。究其原因，第一是因为李嘉图的价值论、分配论更好地适应了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地主阶级、要求实行谷物自由贸易的愿望；第二是因为李嘉图关于工资的维生论观点也正好符合当时的现实，这使他的理论带有强烈的逼真性；第三是因为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成为不满现状的工人群众的思想武器；第四是因为李嘉图把经济学改造成一个仅依存少数几条公理而推导出来的演绎体系，在方法上表现出创新精神，给其他经济学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使他们中的不少人愿意聚集在他的旗帜下，以他作为新的起点，来彻底解决价值论、分配论问题。当时与李嘉图展开争论的其他经济学家，没有一个成为某个学派的领袖人物，由此可见李嘉图体系的魅力。

李嘉图学派对李嘉图体系的深化和拓展，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主要是詹姆斯·穆勒的功劳；但在价值论和分配论方面，却未能取得预想的成功，这是由于麦克库洛赫等人对“劳动”概念所作的重新解释无法使人信服，从而无法消除李嘉图体系的两个内在矛盾。这逐步削弱了专业学术团体对李嘉图体系的信任。

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日益明显，资产阶级对价值论、分配论的需求落点开始变化，他们日益需要那种能证明资本收益具有经济合理性的价值论、分配论，而不是李嘉图的那种认为一切财富源于劳动的理论。西尼尔的节欲论恰好是对李嘉图价值论、分配论中过激成分的一种抵消。

同样，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给社会带来的阵痛逐渐消失，工人阶级（尤其是其上层）开



始享受工业革命的红利。这使李嘉图的维生工资论逐渐失去逼真性。

这一切都使得思想市场越来越不可能在李嘉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的基础上实现均衡。但是由于李嘉图体系的巨大声望,要完全抛开李嘉图体系来实现均衡也不可想象。

于是,一个在多年的行政工作中养成妥协、调和习惯的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李嘉图、马尔萨斯和西尼尔的经济学为知识资本,以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思想为社会哲学背景,建立起一个在理论上折中调和、在政策主张上提倡渐进改良的综合体系。这一体系在政策主张上迎合了英国社会中大多数公众和政府的需求,在理论特征上迎合了专业学术团体希望实现理论内部协调的需求,因此它导致了思想市场的均衡。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一段时间里,该体系实际上接近于垄断了当时整个英国经济思想的市场。它的这种权威地位与英国1846年废除《谷物法》之后出现的经济繁荣局面大有关系,这种局面如果不是证实,起码也是表明了它所主张的自由贸易政策的成功。公众和政府以至专业学术团体,通常总是愿意信服那种在他们看来带来经济成效的理论。经济状况越好,越是令人满意,在思想市场中出现自然垄断(区别于由政府强制推行某种思想所导致的垄断)的可能性便越大。

小穆勒的综合体系为后来马歇尔对微观经济学进行的第二次综合提供了重要的知识资本。

4. 边际革命的发生:从供给角度的说明

小穆勒的综合体系所导致的思想市场的均衡局面以及它所处的垄断地位,被19世纪70年代初以后的边际革命所打破。在英法两国,边际革命并非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而是要求经济理论说明收入分配现象的结果。因此,边际革命是公众和政府的需求落点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但在德奥两国是否也同样如此尚待考察。

要运用供求模式来分析边际革命,首先要把它看作一个从19世纪最后30年开始到20世纪的绵延连续的过程,而不能把它看作发生在1871年的一个事件。从过程的角度看问题,就必须对边际主义的起源和传播扩散的原因分别进行分析。边际革命的起源多半要从供给方面去找原因,其传播扩散的原因则多半要从需求方面去寻找。其次,必须破除一种成见:相同的思想只能在相同的环境中涌现。其实可以殊途同归,既然相同的社会环境和学术背景会产生不同乃至对立的经济思想,那么为何相同的经济思想就不能源自不同的环境呢?1871年以前,经济学远不像今天这样能进行跨国传播,各国经济学家之间多少有点处于隔离状态。

边际革命的最初成果是边际效用价值论。杰文斯、瓦尔拉斯及门格尔这三位奠基人之所以选择研究价值问题而非其他课题,显然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及国度的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有关。但他们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而非其他价值论,则与他们各自的学术环境有关,与他们在这种环境中积累的知识资本有关。

从学术环境和可供使用的知识资本来看,边际革命的三位奠基人的情况既有不同,又有相似之处。在英国,虽然早在19世纪30年代,西尼尔和劳埃德就已经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一些萌芽观点(它们是否成为杰文斯的知识资本尚待考察),但当时处于正统地位的是以小穆勒的综合体系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但到19世纪60—70年代,古典经济学的正统地位由于其工资理论(维生工资论和工资基金论)所受到的攻击而削弱。英国1846

年废除《谷物法》之后，尤其是 1871 年前后英国从美国进口的廉价食品大量增加，导致绝对工资水平的稳步上升。这无疑是对维生工资论所依存的前提——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一大冲击。维生工资论和工资基金论都无法解释绝对工资水平的上升。同时这两种工资理论也无法有效地解释相对工资的差异，而这种差异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职业分化的加剧、劳动技术档次的拉开而变得日益明显。如果说维生工资论和工资基金论大致符合 19 世纪初工业革命初期的现实，那么随着现实本身的变化，这两种工资理论显然已不再符合 19 世纪中叶以后英国现实的工资情况和变化趋势。除了工资理论以外，古典学派的生产费用价值论也由于缺乏对需求的重视而显得不够完美。在古典经济学正统地位大为削弱的背景下，杰文斯从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出发提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确实是针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

但用“革命”一词来表征瓦尔拉斯和门格斯的贡献便不妥当了。法国有着效用价值论的悠久传统，连传播斯密理论的萨伊也是效用价值论者，瓦尔拉斯的父亲更是一位主张效用价值论并提出稀缺性概念的经济学家。瓦尔拉斯的父亲无法对稀缺性进行定量描述，所以把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留给了瓦尔拉斯。法国数学家古诺于 1838 年出版《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用数学方法研究和表述了商品的供求与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指出各种商品价格之间的相互影响，但把为这种影响建立数学模型的任务遗留了下来。瓦尔拉斯正是继承了他父亲和古诺的知识资本，用边际效用衡量稀缺性，解决了他父亲未解决的问题；用联立方程建立一般均衡模型，解决了古诺留下的课题。可以说瓦尔拉斯的贡献完全不是对法国已有经济思想的革命，而是发展和完善。

至于门格尔，从他 1871 年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的引证情况来看，德国旧历史学派和其他一些德国经济学家都对他影响很大。门格尔谦恭地认为自己的见解是以这些德国经济学家的观点为基础的进一步改进，是对卓越的德国同行的一个微弱回声。因此可以说门格尔的贡献是德国 19 世纪初期和中期的经济学说的发展和延伸，并非一次对抗德国旧历史学派的革命。只是在 12 年之后，在是否要建立抽象演绎理论这一更深层次的问题上，门格尔才与德国新历史学派展开对抗。

虽然这三位奠基人所处的学术背景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因素可能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同时提出起了催化作用，那就是数学微积分的发展和普及。有确凿证据表明，这一因素对于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是起作用的，也有一定（但尚待确定）的证据表明它对门格斯的创造有影响。杰文斯完全以标准的导数形式表述边际效用概念，瓦尔拉斯通过与洛桑大学一位显然精通微积分的力学教授的交流，解决了从边际效用递减率推导出需求函数的难题。

5. 边际主义的传播：需求落点转移的结果

边际主义的传播，或者说边际主义最终成为公众、政府和专业学术团体的需求落点的原因，主要应从需求方面寻找。一种社会科学方面的思想要成为需求落点，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该思想所显含或隐含的政策主张要符合需求者的利益和价值取向。二是该思想所采用的分析工具和表达方式要符合需求者的知识素质。

有利于边际主义成为需求落点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边际效用价值论成为